

【山师学人系列】

□刘增人

1959年秋,山东师院中文系招收了240名新生,编为四个班,我在四班。那时的山师,只有三座教学用的楼房,据说是余修副省长主持修建的。房顶都是一水儿的翠绿色琉璃瓦,套用某笑星的术语,那是相当的壮观。三座楼曾被戏称为“千佛山下三座庙”,也是上世纪50年代“反浪费”的“典型案例”之一。中间一座最大,当时叫“文化楼”,东边的叫“教学一楼”,西边的叫“教学二楼”,倒也容易记忆和辨识。中文系在教学二楼。当时,几乎所有课程都是大班上课,240人齐刷刷地聚集在一间联合教室,真是蔚为壮观。只有外语、语言学概论,现代汉语等少数语言课,才小班上课。

教授语言学概论的是苏曼先生。学兄们私下说,这位先生可“不简单”,头上的帽子就有两项:一曰“教授”,二曰“右派”。也有人奋起反驳,说仅仅是“讲师”而已。对于前者,学兄们似乎兴趣不大,因为并非苏曼先生“专属”;而对于后者,却非常新鲜,可能是因为“稀缺”吧。苏曼先生的外貌,就非同寻常:硕大的脑袋,庄

【三声楼读记】

□虞云国

对崇拜的大师,学术粉丝很难做到钱钟书说的那样,假如你吃了个鸡蛋,觉得不错,何必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?即便无缘面谒,粉丝们也奢望知晓些大师的细节。今年是吕思勉诞生130周年,我也来八卦一下他在学术外的那些癖好吧。

吕思勉谦称自己“不善棋而颇好弈”,七八岁时,见了棋谱就喜欢。日后,他几乎收齐了传世的象棋残谱,“久置书篋中”。十二三岁时,他旁观父亲与姑父下围棋,“乃略知死活”,但认为他俩“棋皆极劣,不能教子”。母亲严管他读书,也不准他下棋。

1903年,吕思勉赴南京参加晚清末次乡试,有暇便到夫子庙茶肆看围棋高手束云峰与汪叙诗对弈。1905年起,吕思勉在故乡常州教小学,结识了苏州学者刘眷生等棋友,还互相通函论弈。1911年,他客居南通,与围棋名手陈伐宾对弈,对方约让三子。

民国以后,吕思勉在上海结识了同籍姜鸣皋、吴伯乔与其他棋坛人士,包括在刻印古棋谱上颇有贡献的邓元鏞。姜鸣皋参与过公车上书,为官“所至弘扬棋道”;他曾注范西屏《四子谱》,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;还有弈友诗20余首,可惜散佚。《围棋纪事诗》说他:“姜被怡怡气宇昂,公车爱国热心肠。注传诗失良堪惜,余教犹能衍异乡。”也难怪吕思勉评鹭常州籍弈人,“以姜君鸣皋为最高,吴君伯乔、屠君雄卿次之”。

吕思勉棋艺如何?据其自述,1918年客寓苏州时“技术亦稍进”,已与屠雄卿

# 苏曼先生

如果有人想描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奇人物,我建议选取苏曼先生作为蓝本。如果有人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多么博学的人物,我也建议以苏曼先生为例证。

严地安装在不足1米6的身材上,显得异常招眼。稀疏的头发,每一根都安排得恰到好处,从无散乱失态。脑袋大,就证明学问多,是否教授,学兄们也就不太计较了。苏曼先生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,发音的音程、音速、口型……都准确到无可挑剔。要知道,我们那个年级里,可是有不少学兄是探听、通晓学界典故的专家,尤其是诸师的学养、家世、癖好、祖籍乃至主要流传在老师们之间的外号,也都门儿清。用时的尊称,或许就应该叫做“学霸”吧!

苏曼先生讲到国际音标时,就由他的助教崔西璐先生帮助,把各种图标一一展示在黑板前。为了让大明白国际音标的好处,他特地让崔先生事先挑选出各地方言的“代表”发音。我是潍坊人,就让我说“好是好,就是老了”,土得真是“掉渣”。班长赵玉清是滕县人,就说“勒福(二叔),老福(老鼠)掉进非冈(水缸)里,福得福得的(胡达胡胡的)”。学兄王斯密籍贯郟城,他表演的是“爱尔啁嘻哈哈汤”(昨天晚上吃的什么饭)”。淄博的学兄真真切切地甩

掉了所有“儿化音”,让大家听到“小孩”、“铜钱”、“眼眼”、“麻线”之醇正的淄博版。日照的则演说起“登边出了个恒益头,腾衡腾衡”(东边出了个红日头,通红通红)……然后苏、崔二先生就指导我们用国际音标一一注出。每种方言的表演之后,往往是哄堂大笑或交头接耳。出了名的枯燥的语言学概论课,居然变成了各地方言的纠正课以及同学之间感情的交流课。匆匆五十多年过去了,这些往事,依然历历在目。真不能不敬佩当年老师的苦心孤诣,用心教书。

但不久,苏曼先生就迅速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,谁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,也无从得知他的过往与生平。老同学相聚,也很少有人能够描绘出这位像“流星”般掠过我们课堂的老师的背影。

最近,我却无意中得知先生的履历,极想写出来以供也如我一样渴望知道先行师行状的学兄参考与批评。如下:

苏曼,又名苏漫、苏上达(1898.4——1972.11),辽宁辽中人。先留学日本,后

赴美留学,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。1926年任上海民国大学教授。曾任沈阳商务印书馆经理、沈阳东北交通用品制造厂经理、天津精华书局经理,被民国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新疆省银行经理,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省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1934至1944年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十年,曾与毛泽民、陈潭秋等人关押在一起。盛世才离开新疆后苏曼才出狱。此后先后在重庆大学商学院、四川大学、成华大学、山西大学等校的工管系任教授。1955年8月起任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。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,1958年降为讲师。1968年被捕入狱,被关押10个月。1972年11月在聊城病逝。著有《广告学纲要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)、《广告学概论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)等。

如果有人想描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奇人物,我建议选取苏曼先生作为蓝本。如果有人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多么博学的人物,我也建议以苏曼先生为例证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、青岛大学教授)

# 吕思勉好弈

他为谢侠逊《象棋秘诀》作序,强调棋理错综变化,“固与一切事物同”:“必始于至简,由是推之繁。惟至简者之所知不讹,则稍繁者之所推可信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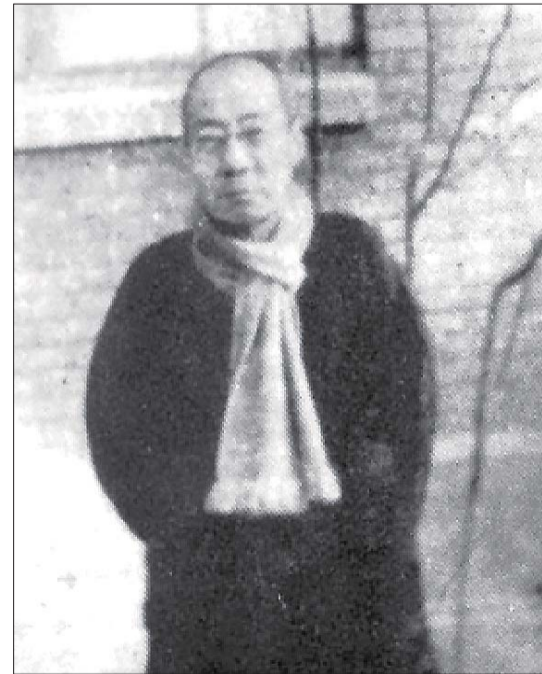
旗鼓相当。1920年起,他任教沈阳高师,自称“沈无弈人,三年中只与北京魏君华萱相遇,曾弈,弈数局耳。华萱亦北京名手,技稍逊于予也”。吕思勉决非自吹自擂之辈,据此推断,其棋艺应该不错。

三年以后,吕思勉自沈阳南归,基本不再下棋,但偶尔仍会技痒。其后,他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,也关注棋艺优长生。据他说,“学生中好围棋者二人,曰顾颂德、常熟郑之驥,技视予皆少优。”足见他与学生也对弈,否则何以知棋艺之优劣!

吕思勉不仅嗜棋,还深研棋谱与棋理。1918年,他校阅了清代《梅花谱》,在识语中比较了象棋与围棋的异同,对两者棋谱行世之多寡、决胜棋法之精粗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他还说,博戏容易“长行险微幸之心,益凭凭叫嚣之气”,不如棋艺“专恃智力,以决胜负,胜固欣然,败亦可喜,所谓‘其争也君子’”。八年后,他为校本新写了识语,交付出版。

1925年,吕思勉与棋王谢侠逊在《上海时报》的《象棋质疑栏》上以通信探讨棋艺。他还请谢侠逊到光华大学讲解棋局、指导学生;建议棋王搜辑汇刻传世象棋棋谱,“为前此精于艺事者昭悬万古,亦足为国家艺术增光”。1928年,他为谢侠逊《象棋秘诀》作序,强调棋理错综变化,“固与一切事物同”:“必始于至简,由是推之繁。惟至简者之所知不讹,则稍繁者之所推可信”。从棋理悟透史局,这与他在民国初年写的诗是一脉相通的:

静思世事与棋同,



▲吕思勉先生

负局支持苦到终。一著偶差千劫定,输赢毕竟太匆匆。

抗战时期,吕思勉避寇居乡,有时也“观谱下棋消遣”,如有会棋的学生来访,他也会邀下几局,甚至赠以自己校印的《梅花谱》。有学生问他,能否用数学计算出棋盘运子的所有变化,编成棋谱,稳操胜券。他回答:“说不定将来会有一种计算的机械,得以解决这样的难题。要是当真如此,以机械代替技艺,弈棋的兴味将大大减低。弈棋的兴味,在乎斗智,并非斤斤计较胜负。”这与他“其争也君子”说是一以贯之的。

吕思勉下棋的兴味至

老不衰。1954年,他回故里养病,还常找友人对弈。其11月22日日记说:“至大庙弄人民银行交电费,拥挤,至顺兴,拟小坐复往,与浦寿观围棋两局,遂逾银行办事时矣。自三月二十九日在和平与项君弈,归而病,自此未弈也。”大半年没过棋瘾,为了过把瘾,竟误了交电费,活脱脱嗜棋邻叟的可亲形象。1957年,大师快走到生命的尽头,还写了七页《弈棋之经历》,回忆了交往的弈友,留下了值得珍视的棋史文献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)

墨竹是文人画中最重要题材之一,或可说是文人画的肇始。墨竹画法的起源,有说始于唐代的吴道子的,有说始于王维的,也有说出自唐玄宗的,还有传说始于五代后唐名将郭崇韬之妻李氏的。传说李夫人是郭崇韬的战利品,被俘后收为妻妾,她整日闷闷不乐,常以书画解闷。有一夜,她隔窗赏月,见窗纸上有婆娑竹影,越看越觉有趣,竟用笔墨就窗纸上摹写竹影。天亮后再看,竟是一幅墨竹图。不管是谁始创墨竹画法,艺术史上都以文同为墨竹画宗祖。文同(1018—1079年)字与可,他之前,必定是有墨竹之画,但非主流,竹画大多还是双勾着

【宣纸上的故事】

# 高呼与可

□李北山

色,而且仅作背景。文同则单画竹,并且开创了“浓墨为面,淡墨为背”的技法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苏轼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,师文同画竹,也擅长画竹,而且做得更彻底。清代戴熙在其《习苦斋画絮》中曾转述一则他画竹的故事,说东坡在考试院办公,一时兴起,随即提笔蘸着批阅公文的朱砂画起竹子来,同事一看,说:“这世界上哪有朱竹?”东坡答道:“世上难道就有墨竹吗?”由此可知真正的艺术鉴赏突破事物的表象。的确,真正的竹子都是“瞻彼淇澳,绿竹猗猗”,既无朱竹,亦无墨竹,既是写意,又何必拘泥于墨朱?据说自东坡之始,这朱竹之画亦成风流,别具情趣。历代都有名家作朱竹之画。晚明陈继儒《妮古录》就曾记载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也画朱竹,杨廉夫还为之题画云:“网得珊瑚枝,掷向篔簹谷。明年锦棚儿,春风生面目。”

自文同、苏轼而至元四家,墨竹之风大兴,成为单独的画科,名家辈出。如元代赵孟頫、李衍、柯九思、吴镇、倪瓒、明初王绂、夏昶等等均以文同为宗师,后人以“湖州竹派”称之。其中的李衍,画竹直接画成了植物学家。李衍(1245—1320年),字仲宾,和赵孟頫、高克恭并称为元初画竹三大大家,是元仁宗的组织部长(礼部尚书),拜集贤殿大学士。画竹初师王澐游,后来见到文同的真迹,惊为神人,“自悔闻见寡陋”,浩叹文同画竹:“不异杲日升空,烟火俱息;黄钟一振,瓦釜失声。”连苏轼都自叹弗如,于是李衍“悉弃故习,一意师之”,学文湖州。他为了研究竹子,走遍全国,甚至借出公差的机会跑到越南,深入竹乡,区别品类,写出了《竹谱详录》一书,这是世界上最早有图有谱的竹类著作,他在书中共罗列了三百七十四个品种,快逼近今天我国境内竹科的科学分类了。他还在书中对各类竹的各种画法详尽论述,成为历代学习画竹者之津梁。

600年后,一代巨匠石涛(1642—约1707)倾其所能,画了一卷将近4米长的墨竹,颇为得意,就在卷前题写了“高呼与可”四个大字,意思是高呼文与可来看,我画得不比你差。石涛还在这幅著名的《高呼与可图卷》上自题七言绝句:“老夫能使笔头憨,写竹犹如对客谈。十文鱼骨七寸管,搅翻风雨出蒲龕。”就在石涛画出这幅平生得意之作时,一个孩子出世,这个孩子后来成长为中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竹画名家,他就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(1693—1766年)。他把竹画推上了一个无人能够企及的高峰。他说:“四十年来画竹枝,白日挥笔夜里思。冗繁削尽留清瘦,画到生时是熟时。”以其艺术实践发展了“胸有成竹”的艺术理念,提出“胸无成竹”:先要“胸有成竹”,但动笔时,又不必墨守成规,须随手写去,千变万化。实在是武功中的最高境界,就是练到最后,忘记所有招式,以无招胜有招。

墨竹一派,源远流长,所代表的,是独特的中国艺术的审美,是宝贵的中国文人的志趣,笔下之竹,意在象外,无论它是挺拔而直耸云天,还是柔软而随风偃伏,无论它是丰姿而枝繁叶茂,还是枯瘦而疏叶萧索,它都依然故我,坚守着内心的高洁。无论在风中,在月下,在那些树影婆娑的纸上,始终充盈着君子的气息,回荡着大丈夫的吟唱,它是艺术化的中国哲学,承载着中国的文脉以及永不凋零的士之理想。

(本文作者为艺术学者)